

# 人际网络与反教运动：《圣朝破邪集》 人物关系考<sup>\*</sup>

肖清和

已往对明季反教运动的研究常常强调个别人物的作用，未考虑到在反教运动中人际网络的重要性。本文以《圣朝破邪集》为中心，结合相关文献包括明清文集、地方志等史料，梳理《破邪集》中各个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。本文指出在福建、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中，人际关系网络是凝聚反教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；尤其是师生、同年、同僚、同乡、同门等关系在反教群体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**关键词：**人际网络 反教运动 《圣朝破邪集》

**作者** 肖清和，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。

目前，学界有关《圣朝破邪集》、<sup>①</sup> 福建浙江反教运动的研究成果很多，<sup>②</sup> 本文在已有的成果之上，以《圣朝破邪集》为分析对象，结合相关文献包括明清文集、地方志等史料，梳理《圣朝破邪集》中各个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。本文指出在福建、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中，人际关系网络是凝聚反教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尤其是师生、同年、同僚、同乡、同门等关系在反教群体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<sup>\*</sup> 本文是上海大学085项目优青课题《人际网络与宗教传播》的最终成果，并受上海高校一流学科世界史建设项目资助，谨致谢意。

- ① 徐昌治编《圣朝破邪集》，安政乙卯冬（1855）翻刻版，载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《藏外佛经》，第14册（合肥：黄山书社，2005），页317—479；又名《明朝破邪集》，收于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10辑4册，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），页317—470，均是日本安政二年翻刻本。
- ② 孙尚扬、钟鸣旦：《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》（北京：学苑出版社，2004），255—266页；张维华：《南京教案始末》，载《中国近代史论丛》第1辑第2册（台北：中正书局，1956）；张力、刘鉴唐等：《中国教案史》（成都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87）；宝成关：《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激烈冲突——明季南京教案文化背景剖析》，载《史学集刊》，1993年第4期；万明：《晚明南京教案新探》，载王春瑜主编《明史论丛》（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），141—155页；Ad. Dudink: *Christianity in China: Five Studies*, PhD.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1995, pp. 1—176；徐宗泽：《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》（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90）；王治心：《中国基督教史纲》，第九章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）；杨森富：《中国基督教史》，第五章（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8）等均有所提及。最新成果有邹振环：《明末南京教案在中国教案史研究中的“范式”意义——以南京教案的反教与“破邪”模式为中心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Vol. 40（2008）：122—131。另有以《圣朝破邪集》为主要论证材料，论述明季耶佛冲突之著作，参见郑安德：《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德护教辩论》（高雄：佛光山文教基金会，2001）。以及 Kern, Iso. *Buddhistische Kritik am Christentum im China des 17. Jahrhunderts: texte von Yu Shunxi (? —1621), Zhuhong (1535—1615), Yuanwu (1566—1642), Tongrong (1593—1679), Xingyuan (1611—1662), Zhixu (1599—1655)*. Bern; New York: P. Lang, c1992.

天主教入华伊始就开始与佛教产生接触，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—1610）等早期传教士曾一度以“西僧”自称。根据邓恩（George H. Dunne）的研究之后，利玛窦在南京时，曾与三槐（三淮？）和尚<sup>①</sup>有过辩论。<sup>②</sup>利玛窦摇身一变而成“西儒”，之后开始对佛教展开猛烈攻击。在其《天主实义》等著作中，利玛窦大肆抨击佛教教义。天主教徒如徐光启、杨廷筠等均以其专书（如《辨学遗牍》、《辟释氏诸妄》、《破迷》、《代疑篇》等）辟佛。杭州佛教居士、慈山德清弟子虞淳熙曾通过太守翁周野（即翁汝进，字子先，仁和人，1598年进士，亦是焦竑门人，与云栖善）<sup>③</sup>给利玛窦《畸人十篇》写序，<sup>④</sup>但后来意识到利玛窦等传教士辟佛道后，亦与传教士展开辩论，撰有《天学剖疑》、《天主实义杀生辨》、《答利西泰》等文章。虞淳熙在杭州与冯梦祯、屠隆等佛教居士以及莲池和尚过往甚密。<sup>⑤</sup>实际上，虞淳熙、冯梦祯、陶周望、葛寅亮等亦皆是莲池弟子。所谓“海内称十戒五戒弟子者，无虑千万；激扬心要，助转法轮，则虞司勋淳熙，冯司成梦祯，陶祭酒周望，王大行尔康，葛卿寅亮，……皆栋之隆也。”<sup>⑥</sup>葛曾任南京吏部侍郎，著有《金陵梵刹志》（1602）。清初杭州信徒张星曜的父亲张傅岩曾任葛寅亮西席，<sup>⑦</sup>叶向高曾为葛撰写《宪使屹瞻葛公颂德碑》。<sup>⑧</sup>而主持南京反教运动的沈淮与葛寅亮、冯梦祯、袁宏道、谢肇淛等人亦为好友。<sup>⑨</sup>祿宏曾与徐光启辩论失败，沈淮反教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联。<sup>⑩</sup>陶周望与诸会友亦创有放生会。<sup>⑪</sup>冯梦祯与瞿汝稷（管志道门人、其弟瞿汝夔曾劝利玛窦改穿儒

① 关于“三槐”是否即指雪浪（三淮），则有不同意见，参见王任光：《“三槐”质疑》，载《上智编译馆馆刊》第三卷第五期，200—201页；陆嘉谟：《关于“三槐”之讨论》，《上智》第三卷第六期，236页。林金水：《利玛窦与中国》（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6）认为“三槐”即雪浪（231页）。

② 参见邓恩（George H. Dunne）：《利玛窦到汤若望：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》，余三乐、石蓉译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，48页。

③ 李日华：《大参翁周野先生墓表》，载李日华：《恬致堂集》卷二十六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064册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616上—620页下；翁汝进，子为翁骏，孙为翁之琪，兄弟为翁汝遇（子翁开之、孙翁佑、曾孙翁嵩年）；翁与黄汝亨同年，翁汝遇则与杨廷筠同年，《康熙仁和县志》，355页下、202页上。

④ 虞淳熙：《畸人十篇序》，载《虞德园先生集》卷六，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：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43册，250上—251页下。因为虞淳熙的反教立场以及该序对天主教的理解不符合天主教教义，如“惟心性之为太极，而太极之生上帝，我范我国，天且弗违”（《畸人十篇序》，《虞德园先生集》卷六，250页下），该序未被收入天主教出版的各个版本的《畸人十篇》中。

⑤ 冯梦祯在其《日记》中提及，曾与虞德园（即虞淳熙）一起赴杭州六和塔晤莲池和尚，参见冯梦祯：《快雪堂集》卷四十七，载《四库全书存目全书》集部164册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96，672页上。

⑥ 吴应宾：《莲池大师塔铭》，《云栖遗稿》，《莲池大师全集》，台北：东初出版社，1992，5147—5148页。

⑦ 张星曜在《家学源流》中谓，“既而从屹瞻葛先生游，葛先生遂聘为西席，居葛所三十余年。”参见张星曜《家学源流》附于张星曜：《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》，澳门中央图书馆藏；另张傅岩曾参与录葛寅亮：《四书湖南讲》，参见葛寅亮：《四书湖南讲九卷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经部162册，11页下。

⑧ 载叶向高《苍霞续草》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125册，375下—376页下。

⑨ 谢肇淛有诗《长安初夏，偕沈仲润太史、袁中郎博士郊行》，谢肇淛：《小草斋集》卷二十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175册，377页上。

⑩ 黄汝亨、顾起元、王肯堂曾序高原明显《成唯识论俗论》，而吴用先、葛寅亮、沈淮等捐资付梓。沈淮亦出现在冯梦祯《快雪堂集》（1616）中的友人名单上，参见 Dudink, Ad. “Nangong shudu (1620), Poxie ji (1640), an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Nanjing Perspecution (1616/1617),” *Monumenta Serica* Vol. 48. 2000, pp. 211—217.

⑪ 彭际清：《居士传》，第56传，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，1991。

服)曾推动嘉兴藏的刻印。<sup>①</sup>而曾序冯梦祯《快雪堂集》的顾起元(字太初,1565—1628),亦是叶向高之弟子。<sup>②</sup>朱国祚、陈懿典(焦竑门人,曾序沈淮《南宮署牍》,并为其辩护;并曾捐刻佛经<sup>③</sup>)、虞淳熙、翁汝进、黄汝亨、<sup>④</sup>钱谦益、瞿式耜等曾是径山寺的“外护”。<sup>⑤</sup>翁汝进、黄汝亨、陶周望等是云栖寺(株宏)“檀越”,陶周望、周汝登、葛寅亮等则是云门显圣寺(湛然圆澄)“檀越”,陶周望、周汝登亦是天童寺(密云圆悟)“檀越”。<sup>⑥</sup>黄汝亨与曾跋《锲浑盖通宪图说》(李之藻著)的樊良枢(字致虚,仁和令)往来频繁,<sup>⑦</sup>黄汝亨、熊明遇、顾起元、李日华、虞淳熙等之间均有交往。<sup>⑧</sup>李日华与沈演(沈淮之弟)也有所往来。<sup>⑨</sup>

相对而言,佛道辟天主教的著作并没有天主教辟佛道的著作那么多。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编纂于崇祯十二年(1639)的《圣朝破邪集》以及刻于崇祯十六年(1643)的《辟邪集》。<sup>⑩</sup>后者主要内容为钟始声居士(字振之)与际明禅师的往来信函,以及钟始声所作的《天学初征》与《天学再征》,序者为越溪天姆峰杲庵释大朗,评述及梓行者为新安人程智用(字用九)。但由于释大朗、际明禅师以及钟始声者只是同一人,即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之满益智旭,因此《辟邪集》不是佛教群体批评天主教的成果。<sup>⑪</sup>而《圣朝破邪集》中文章的作者不仅有佛教僧众,而且也有与佛教处于同一立场的儒家士大夫。编者徐昌治,浙江海盐人。曾任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司事徐从治与其同籍同里,后任登莱巡抚,并死于孙元化所铸造大炮之下。<sup>⑫</sup>徐昌治为费隐通容的弟子。通容“以数帙授”于徐昌治。徐“编其节次,牒其条款,列其名目”,从而编纂成《圣朝破邪集》。该书共八卷,59篇文章。徐昌治显然是佛教居士,自号无依道人。曾撰有《金刚经会解了义》一卷,《般若心经解》一卷(其子徐升贞、徐乾贞、徐拱枢、徐颐贞同校)。又撰有《高僧摘要》,自题“甲午岁菊月登高日,无依道人徐昌治覲周父谨题。”其所撰《祖庭嫡

① 《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》,《憨山老人梦游集》卷十四,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5,493页。

② 顾起元有《苍霞草序》,自署“江宁门人顾起元撰并书”,参见叶向高:《苍霞草》,载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124册,6页上;同时,顾起元之父与焦竑有“莫逆之好”,参见顾起元:《澹园先生挽诗二十八首有序》,载顾起元:《遯园漫稿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104册,162上—165页上。

③ 杜泽逊:《四库存目标注》(四)子部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,2402页。

④ 杨廷筠父亲杨兆坊的门人,熊明遇的老师,以及顾起元的好友,参见黄汝亨:《杨氏塾训序》,杨兆坊:《杨氏塾训》六卷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152册,85上—86页下;熊明遇:《寓林集序》,黄汝亨:《寓林集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042册,18上—20页下;顾起元:《寓林集序》,《寓林集》,2上—4页下。

⑤ 《径山志》卷十一,杜洁祥:《中国佛寺史志汇刊》第1辑,台北:明文书局,1980,992—1001页。

⑥ 徐一智:《明末浙江地区僧侣对寺院经济之经营——以云栖株宏、湛然圆澄、密云圆悟为中心》,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,2001,219—220页。

⑦ 黄汝亨:《天目游纪一卷》(陶望龄序)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251册,807页下。

⑧ 熊明遇自称为黄汝亨的“门人”,顾起元则称为黄的“年弟”,参见黄汝亨:《寓林集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042册,20页下、4页下;黄自称为虞淳熙的“社友弟”,黄汝亨:《虞长孺集序》,《虞德园先生集三十三卷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集部043册,124页上;李日华则有《黄贞父先生寓林诗集叙》(自称为黄汝亨的“年弟”)、《虞德园先生集序》(自称为虞淳熙的“友弟”)。

⑨ 李日华:《味水轩日记》第4册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5,嘉业堂丛书,31页a。

⑩ 方豪:《影印〈辟邪集〉序》,见《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》(一),页29。另参见孙尚扬:《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》,载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1998年第4期,92页。际明禅师即满益智旭(1599—1655),俗姓钟,名际明,又名声,字振之。先世汴梁人,始祖南渡,居古吴木渚。

⑪ 1860年,日本僧人杞忧道人将若干《辟邪集》中的文章(如通容的《原道辟邪说》等)辑入钟始声的《辟邪集》中,且以《辟邪集》为名刊刻出版,以作为反基督教的手段。周驊方《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》卷四有载,245a—279页b。

⑫ 《明史》卷二百四十八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,6430—6436页。

传指南》（自署“壬辰秋季登高日，徐昌治覲周父题大业堂中”<sup>①</sup>）主要辑录七佛、西天二十七祖、菩提达摩，至慧能东土六祖，以及南岳怀让，至费隐通容等佛祖嫡传诸师之事略、师资机缘语要，以作为祖庭学人之指南。卷首有作者自序，卷末附有金粟百痴禅师跋语、费隐通容禅师题语、付法语偈及编者之和偈等。该书被收入《续藏经》第二编乙第二十一套。《祖庭指南》“本师费隐禅师寄赠”中有云：“居士昔著儒书，今宣佛旨。”<sup>②</sup>表明徐昌治曾为儒家士大夫，后转向佛教。而“附刻本师费老人付法语偈”云：“覲周徐居士，护持老僧，弘扬祖道，自金粟至天童，自天童至福严，自福严至径山，将二十年。心不异缘，犹如一日。”<sup>③</sup>更表明徐昌治多年如一日护持佛教的发展。徐昌治后并参黄檗隆琦，而隆琦弟子行玘、行元等曾撰写反教文章。将徐昌治的身份定义为佛教居士，并不表明其与儒家分道扬镳。实际上，当时不少儒家士大夫出入三教之中，尤其当“三教合一”思潮流行之时，不少人既是儒家士大夫，又是佛教居士。那些高僧大德更是认为佛教与儒家在根本上是相一致，而不冲突。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株宏弟子张广湑曾撰有《释门真孝录》。<sup>④</sup>另一高僧费隐通容评价徐昌治云，“盖生平于孔孟及我教乘理致大同之旨，淹贯甚熟。”<sup>⑤</sup>徐光启座师焦竑更是认为，如果佛教经典能够“发明”儒家之理，那么佛教经典即是“孔孟之义疏”。因而，其对批评佛道的言论相当不以为然。如其所言：“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，苟能发明此理，为吾性命之指南，则释氏诸经，皆孔孟之义疏也，而又何病焉？”<sup>⑥</sup>

## 二

《破邪集》实际上记载了四、五次大大小小的反教运动。其中在南京教案（1616）之前有利玛窦与虞淳熙的辩论、利玛窦与云栖株宏的辩论。此还是规模很小的、仅在书信等层面上的辩论。1615年，云栖株宏将与利玛窦所辩论的内容辑为《天说凡四》。20年后，天主教群体出版的《辨学遗牍》中加上了杨廷筠以及李之藻的跋。称云栖株宏在临死之时，有自悔云：“我错路矣，更误人多矣”等语。<sup>⑦</sup>云栖弟子张广湑对此“骇且疑”，并撰《证妄说》加以反驳。显然《辨学遗牍》并不是利玛窦本人所著，而在杭州与在福建所出版的《辨学遗牍》内容并不相同。福建出版的《辨学遗牍》加上了杨廷筠记载云栖临终“自悔”之跋，不料有禅师从福建将此书带给张广湑，引起了较大的反应。张广湑邀请佛教内僧人（即云栖古德大贤）共证。<sup>⑧</sup>

1615年云栖《天说》出版后一年，南京教案随即展开。南京教案之后，崇祯初期由于徐光启起复再任，天主教再度发展。而随着艾儒略（Jules Aleni, 1582—1649）在福建传教活动的快速展开，福建浙江的反教运动亦随之形成。此次反教活动主要领袖则为佛教居士、自称“白衣弟子”黄贞。此次反教运动主要集中于1632到1639年，地点则主要在天主教群体相对集中的福建、浙江等地。主要参与者除去佛教僧人、居士之外，还有官员、士大夫、生员以及没有功名的“布衣”等等。显然，《破邪集》是将不同反教文集中的文章以及相关的禁教文告、揭疏等汇成

① 《祖庭指南》卷一，载《已新纂续藏经》，第八十七册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，1984年，0386页b。

② 《祖庭指南》卷二，载《已新纂续藏经》，第八十七册，0451页a。

③ 《祖庭指南》卷二，载《已新纂续藏经》，第八十七册，0451页a—b。

④ 该书以佛教经典中相关言论，说明佛教出家修行与儒家孝道互不冲突；同时，亦论证佛教对儒家孝道的充分尊重与认可。参见张广湑辑：《释门真孝录》5卷，香港：妙法精舍，1960年。

⑤ 《祖庭指南》卷二，载《已新纂续藏经》，第八十七册，0451页b。

⑥ 参见焦竑：《答耿师》，载《焦氏澹园集》卷十二，台北：伟文图书出版社，1977，377页。

⑦ 张广湑：《证妄说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七，633页下。

⑧ 释大贤：《附缙素共证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七，637页上。

一集。徐昌治只是最后的编者而已。1634年,杭州释普润在《诛左集缘起》表明,在福建、浙江反教运动之前,就有不少佛教僧众写过反对天主教的文章,因此编成《诛左集》。<sup>①</sup>至于《诛左集》到底包含哪些文章则不得而知。

1637年福安爆发反教运动,逮捕夷人四名、教友黄尚爱等人。起因是因为福安生员郭邦雍、黄大成、谬兆昂、郭若翰等在其乡设立夷馆,集众从教。后更起获从教生员陈台臣、陈五臣、黄元中、谬士响、谬仲选、郭崑、陈端震、郭弘惠、阮孙贯等人。<sup>②</sup>这些人在福安跟随方济各会传教士习教,并在官府逮捕传教士后,为之积极奔走呼号。<sup>③</sup>官府在相关文告中称天主教“独有天主为至尊,亲死不事哭泣之哀,亲葬不修追远之节。”<sup>④</sup>官府在文告中称奉教生员黄大成、郭邦雍等甘当化外之民,对官府逮捕传教士愤愤不平,“直赴本道为夷人护法。极口称人间追远祭祀为虚文,惟天主为真实。”<sup>⑤</sup>而且更因此次事件,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、阳玛诺(Emmanuel Diaz, 1574—1659)等亦遭到驱逐出境的处罚。1638年李维垣等人发起《攘夷报国公揭》。当时曾任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蒋德璟(1593—1646)路经福州,福州反教官员、儒生、布衣等趁机联名上书,希望蒋德璟能“入告朝廷、尽除以华夏,生灵幸甚,道脉幸甚,天下后世幸甚。”<sup>⑥</sup>其中官员27人,儒学生员7人,布衣5人,共39人。蒋德璟曾与传教士有过往来,并与对天主教有好感的黄景昉交善。蒋德璟一开始对待天主教的基本态度就是“其教可斥,远人则可矜也。”而受黄贞的邀请,蒋德璟即为《破邪集》写序。虽然蒋德璟认为“西人”“原不足驱”,但需要以“阐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”。因此,蒋德璟认为《破邪集》实际上不是在反对传教士,而是“有功于西士。”<sup>⑦</sup>虽然蒋氏愿意为黄贞《破邪集》写序,并接受李维垣等人的《公揭》,但蒋氏之态度显然有异于黄贞等反教群体。

除去其积极编纂《破邪集》之外,黄贞还曾发起反对天主教的组织,即“黄天香词盟”。所谓词盟主要是指一种文学结社。黄天香词盟主要目的就是反对天主教。其主要原因则是如唐显悦在《题黄天香词盟》中所言,“疾彼西人,酿兹祸水,圣脉几沉,佛日渐晦。”黄贞为反对天主教而积极奔走,所谓“不远千里,呼朋辟邪。”<sup>⑧</sup>而唐显悦与蒋德璟亦有同年之谊(天启二年文震孟榜)。<sup>⑨</sup>因此,《破邪集》中有不少序以及反教文章均为受黄贞邀请而做的,而这些作者大部分与黄贞有某种社会关系,诸如师生关系等等。其中颜茂猷为黄贞的老师,其于崇祯七年(1634)“文兼《五经》,作二十三义”成进士。<sup>⑩</sup>颜更著有《迪吉录》成为明末以来非常重要的“善书”之一。<sup>⑪</sup>颜氏之所以反教,不仅仅因为其门人黄贞之邀请。其在序黄贞《破邪集》中称“艾儒略等传教士”为“艾妖辈”,概可表明其憎恶之情。颜氏又言,艾儒略到漳州后,“归人如市”,又“买地搆堂”。<sup>⑫</sup>显然,天主教在漳州的快速发展是促使颜氏反教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① 释普润:《诛左集缘起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八,647下—648页下。

② 其中陈台臣后任连江教谕,其与陈端震、郭崑为福安县学,参见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四十一,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3—1986,412页下。

③ 施邦曜:《福建巡海道告示》,徐世荫:《提刑按察司告示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二,545上—548页下。

④ 施邦曜:《福建巡海道告示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二,546页上。

⑤ 同上,546页上一下。

⑥ 李维垣等:《攘夷报国公揭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六,610页上一下。

⑦ 蒋德璟:《破邪集序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,550页上一下。又见于孙承泽:《春明梦余录》,载《钦定四库全书·春明梦余录》卷六十六,240—241页上。

⑧ 唐显悦:《题黄天香词盟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,551页下。

⑨ 参见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三十六,163页上。

⑩ 游子安:《善与人同: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5年,105—106页。

⑪ 同上,111—115页。

⑫ 颜茂猷:《圣朝破邪集序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,551页上。

受黄贞邀请写序的还有苏州府推官周之夔，<sup>①</sup>周亦是福建人，对佛教有好感。其在《重刻〈西方合论〉序》中自称“菩萨戒弟子闽中周之夔”，并言“儒以三纲五常。奠乾坤而正人类。至于截生死逆流出三界火宅，必资佛教。”并有“之夔夙承佛恩”等语。<sup>②</sup>且与居士甘尔翼（右民）及其兄尔牲（左民）等捐资刻印袁宏道《西方合论》十卷以推广佛教净土。其对天主教言“尧舜周孔皆入炼清狱”而大为不满。<sup>③</sup>周早期佞佛，后“一意乱去俳习禅睡，独为真实之学。”<sup>④</sup>周之师董见龙，即董应举，字崇相，闽县人，万历戊戌（1598）进士。<sup>⑤</sup>董与对天主教有好感的曹学佺同年中举（万历十九年黄志清榜）。<sup>⑥</sup>周之夔在苏州时曾与复社有冲突，因此其在《破邪集序》中言“迩来力辟社党，不无见尤焉。”即指其与复社之间有过纠纷。而复社张溥的座师恰好是天主教徒徐光启。<sup>⑦</sup>周之夔与颜茂猷（甲戌进士）以及蒋德璟的弟弟蒋德璠（乙丑进士）同年中举（天启四年程祥会榜）。<sup>⑧</sup>周之夔在南明弘光时（1645）复官给事中，抗清兵失败后，遁入佛寺。与其结交最契者为钱谦益与瞿式耜。<sup>⑨</sup>式耜曾受洗入教，但未曾坚持信仰。<sup>⑩</sup>

黄贞在《破邪集自叙》中亦指出其为反对天主教而“奔走吴越之间”。<sup>⑪</sup>黄贞在福建、浙江等地积极奔走呼号，一方面为编纂《破邪集》而搜集相关的反教文献，另一方面邀请士大夫为《破邪集》写序，同时又邀请反教群体积极撰写反教文章。黄贞的反教活动早在1632年就已经展开，历经七年时间哀辑《破邪集》。即其所谓“呜呼！七年以来，一腔热血，两画愁眉，此身不管落火落汤，此集岂徒一字一血，谈之唇焦未罄，录之笔秃难完。”<sup>⑫</sup>山西人王朝式（字金如，1602—1640），受黄贞邀请撰写反教文章《罪言》，其中提及黄贞从福建来浙江“以狡夷之驾为天主说者相告，愿鸠同志合击之。”<sup>⑬</sup>即是表明黄贞乃反教运动中主要领袖之一。王朝式乃余姚沈国模（1575—1656）弟子，曾入刘宗周“证人社”。<sup>⑭</sup>沈国模“讲明良知之说，其所学或以为近禅。”<sup>⑮</sup>黄宗羲更指出沈国模为密云圆悟“幅巾弟子”。<sup>⑯</sup>因此，黄贞所邀请之士人对佛教或多或少之倾向性不言而喻。

- ① 周之夔，周仕阶子，天启四年中举（1624），辛未进士（1631）。参见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三十八，252页上。
- ② 周之夔：《重刻〈西方合论〉序》，载中华佛教文化馆大藏经委员会影印：《大藏经》第九十三册，诸宗部四，1957年，385页上。
- ③ 周之夔：《破邪集序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，552页下。
- ④ 周之夔：《弃草集·文集序》，载《弃草集》册一，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349页。
- ⑤ 参见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四十三，479下—480页上，撰有《崇相集》。又见《钦定四库全书·闽中理学渊源考》卷四十七，522页。
- ⑥ 参见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三十八，326页下。
- ⑦ 张溥：《〈农政全书〉序》，参见李天纲：《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》，载《史林》1999年第4期，47—48页。
- ⑧ 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三十八，253页下。
- ⑨ 《周之夔与〈弃草集〉》，载《弃草集》，1页。
- ⑩ 参见黄一农：《两头蛇：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》，第九章，南明重臣对天主教的态度，312—324页。
- ⑪ 黄贞：《破邪集自叙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，560页下。
- ⑫ 同上，561页下。
- ⑬ 王朝式：《罪言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，562页上。
- ⑭ 赵尔巽等撰《清史稿·列传二百六十七》。“宗周主诚意，朝式守致知。”“顺治初，卒，年三十有八。”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，300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190页上。
- ⑮ 赵尔巽等撰《清史稿·列传二百六十七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300册，189页下。
- ⑯ 黄宗羲：《思旧录》，“刘宗周”一节，载《清代传记丛刊》026册，台北：明文书局，1985年，3页。

艾儒略在福建晋江时曾与教友李九标等拜访过卓迈以及朱继佐。<sup>①</sup> 艾儒略在叶向高等士大夫支持下,与不少上层士大夫晋接往来。然在《破邪集》中撰写《驱夷直言》的晋江人黄廷师则直言“天主一说,诞谬不通。”<sup>②</sup> 饶有趣味的是,黄廷师与卓迈、朱继佐、庄际昌等为同年进士(万历四十七年庄际昌榜)。<sup>③</sup> 而庄际昌曾赠诗予艾儒略等传教士。而且黄廷师还与黄景昉同年中举(万历四十三年甘汝挺榜)。<sup>④</sup> 但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显然不同。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鼎盛时期,曾收到诸多士大夫的赠诗,天主教群体将之编纂出版为《熙朝崇正集》,旨在为天主教进行宣扬与辩护。漳州反教士人苏及寓在《邪毒实据》即言“公卿士大夫相率诗咏之、文赞之、疏荐之。”<sup>⑤</sup> 即是对此种情况之反映。苏及寓,号恬夫。《邪毒实据》撰于1638年。但饶有趣味的是此本用来宣扬天主教的著作中,却载有周之夔写给传教士的赠诗:“捧出河图告帝期,经行万里有谁知,浑天尚有唐尧历,中国犹传景教碑,地转东南分昼夜,人非仙佛识君师,金声玉齿悬河舌,沧海茫茫不可疑。”<sup>⑥</sup> 至于后来为什么周之夔转向辟天主教,概与周本身就是佛教居士且天主教辟佛有关。上述黄廷师的同年庄际昌亦曾赠诗予传教士。<sup>⑦</sup>

而《破邪集》中另一作者三山黄问道,亦为董崇相门人,因而与周之夔有同门之谊。黄问道在《辟邪解》中有言“吾乡崇相董先生,学正品端,不肖从游门下,先生以天下为己任,……数十年之前,谈及夷教,慨然有崇正辟邪之思,不肖略撰一二说,以附先生之末矣。”<sup>⑧</sup> 可见董崇相的反教言行从利玛窦时代就已经存在。而周之夔、黄问道等反教行为与其师董崇相的态度相一致。

1635年,福州人曾时为黄贞《不忍不言》写序,称黄贞为其“社兄”。黄贞在《不忍不言》中对“天下大沙门座下”自称“白衣弟子”。<sup>⑨</sup> 在此篇文章中主要呼吁佛教僧众为反对天主教而有所行动。同年八月,受黄贞邀请,密云圆悟作《辨天初说》以与天主教展开辩论。<sup>⑩</sup> 并派润禅(即释普润)将《辨天初说》“遍榜武林”(圆悟在宁波天童寺)。八月二十一日,云栖弟子张广湑拿着《辨天初说》入杭州天主教堂。当时,杭州天主教堂中有耶稣会士傅汎际、伏若望以及李之藻儿子李次彪(字仲愨)<sup>⑪</sup> 等人。李问张广湑“黄天香是何处人?”概是看到《辨天初说》中提及黄贞呼吁佛教僧众反教等语。张广湑希望李次彪能为之辩论,但李次彪要赴江西上任,只是赠给张广湑《辨学遗牍》一册。三日后,张欲再次赴堂,却被“司閤者”拒之门外。圆悟根据张广湑所述在杭州天主堂的经历,撰成第二篇辩论性文章《辨天二说》。九月,圆悟再次派人将《辨天二说》“遍榜武林”。十月,张广湑又持《辨天二说》赴杭州天主堂,欲与天主

① 艾儒略等:《口铎日抄》,载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》第七册,钟鸣旦、杜鼎克编,台北利氏学社,2002,152、528页。

② 黄廷师:《驱夷直言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,563页下。

③ 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三十六,27页a。

④ 《钦定四库全书·福建通志》卷三十八,71页a。

⑤ 苏及寓:《邪毒实据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三,565页上。

⑥ 《熙朝崇正集》,载《天主教东传文献》650页;又载周之夔:《弃草诗集》卷之五,《弃草集》册一,扬州: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97,228页。

⑦ 《熙朝崇正集》,载《天主教东传文献》648页。

⑧ 黄问道:《辟邪解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五,600页上。

⑨ 黄贞:《不忍不言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七,621页下。

⑩ 释圆悟:《辨天初说》,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七,623页下。

⑪ 参见[葡]傅汎际(F. Furzado)译义,(明)李之藻达辞:《名理探》,《万有文库》版,第二集七百种(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5),“又序”,7—9页。前有山东布政司参政李天经序。又有可能是李之藻的另一个儿子李长楸,参见龚缨晏、马琼:《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》,载《浙江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3(2008):89—97。李次彪曾与徐时会(嘉之)“参订”反教领袖黄贞老师颜茂猷的《新镌六经纂要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222册,6页下。

教辩论。张在天主堂内遇到教友范某。范某因游于杨廷筠而入教。这次天主教改变了以前的策略，不再与张广渢辩论，即“凡有书出来无不收，然必不答。”大概杭州天主堂为了避免与佛教僧众发生直接冲突，而拒绝与回应任何辩论。教友范某称之为“教中大主意”，大概是教会内的一项决定。<sup>①</sup>十二月，圆悟再次根据张广渢所述经历撰成《辨天三说》，与天主教展开更深入的辩论。但天主教似乎并没有做出回应。上面所述佛教的反教运动仍以黄贞为主要推动者，而佛教居士张广渢者则是充当信息传递者，并与天主教群体发生面对面的接触。密云圆悟在居士黄贞、张广渢等人的推动下与天主教展开辩论。

### 三

天主教群体虽然采取“避让”的策略，但并非对此视而不见。实际上甚至到清初，天主教群体仍然对佛教反教文献展开反击。清初天主教徒刘凝撰有《辨天童密云和尚三说》<sup>②</sup>等文章，反驳密云的《辨天三说》。刘凝还对漳州保福超悟（即拈松和尚）的《三教正论》展开反驳。而超悟曾参行导禅师，行导又曾参圆悟。超悟亦曾辑录过徐昌治语录，即《无依道人录》。<sup>③</sup>

圆悟法嗣木陈忞、云林琇等与顺治帝有过密切交往，此时汤若望亦与顺治帝过往甚密。但最终顺治帝倾向于佛教，而欲落发为僧。<sup>④</sup>木陈忞在《北游录》中提到，顺治帝曾经对天童圆悟的《辨天三说》评价甚高。其言“《辨天三说》道理固极于透顶透底，更无余地可臻矣。即文字亦排山倒海，遮障不得，使人读之胸次豁然云披月现。”而且，顺治帝还令冯铨以及“词臣”“制序将谋剖剔，宣示中外，使天下愚民不为左道所惑。”<sup>⑤</sup>后来自称紫柏真可的“私淑弟子”的钱谦益，将载有《辨天三说》的《北游录》重刊，并序之。天主教徒刘凝撰《辨天三说序辩》予以反驳。木陈忞曾通过唯一普润所带来的天主教书籍，而对天主教有所了解。《北游录》中还提及顺治帝对汤若望所进呈的书籍，认为“天下古今，荒唐悠谬之说，无逾此书。”<sup>⑥</sup>由此可见，晚年顺治帝对待天主教与佛教态度可谓大不相同。

清初僧人普仁截曾对署名徐光启的书籍《辟释氏诸妄》展开辩论，撰成《辟妄辟》。此处普仁截，即截流行策和尚（1628—1682），因康熙时居虞山普仁禅院，而称普仁截。相传其是憨山德清的转世，后更被尊为禅宗十祖。其后，杭州天主教徒张星曜、洪济则又撰《辟妄辟条驳》为天主教进行辩护。<sup>⑦</sup>

写于1636年的《统正序》，作者乃江西临川人刘文龙（字云子）。其师乃华亭许霞城（即许誉卿）。<sup>⑧</sup>许誉卿在给钱士升《周易揆十二卷》的序中自称“五茸衲弟如觉原名许誉卿题于泖上

① 释圆悟：《辨天三说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七，626页上。

② 该书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，古朗氏编号为7173。参见《パリ国立图书馆所藏汉籍解题目录》，东京：霞ヶ关出版株式会社，1993—1994，86页。另参见郑安德：《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》，第三十三册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，2000，22—40页。

③ 参见徐昌治：《无依道人录》，载《禅宗全书》，60册，台北：文殊出版社，1988，525页以下。

④ 参见陈垣：《汤若望与木陈忞》，载《陈垣集》，黄夏年主编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5，83—108页；又参见陈垣：《顺治帝出家》，载《陈垣集》，125—131页。

⑤ 以上引文参见《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》卷三，载《禅宗全书》，64册，539下—540页上。

⑥ 《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》卷三，载《禅宗全书》，64册，540页上。

⑦ 载于钟鸣旦、杜鼎克等编《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》，第九册，台北：利氏学社，2002年，389—528页。

⑧ 参见《明史》卷二百五十八，6645—6648页。



之了庵”，此表明许是一位佛教居士。<sup>①</sup>许誉卿的叔父许远度曾娶徐光启次孙女徐甘弟大，对于天主教在松江一带的发展举足轻重。<sup>②</sup>刘文龙因其师而获知天主教，但其云华亭“缙绅士庶，口自操刃攻之若寇，日讼于郡公、县公者，人不啻万亿计，状不只千万张。”<sup>③</sup>虽然此言或多夸张，但却可反映出虽然天主教在华亭得到许氏家族的支持，但亦遭到不少的反对与拒斥。1636年夏，其任建瓯同知。<sup>④</sup>其“年兄”詹月如（即詹兆恒）<sup>⑤</sup>任瓯宁知县，“复闻有天主教之寓于建宁也。”但瓯宁并没有像华亭那样有反教的声音，刘文龙认为是因为瓯宁“其俗天性淳厚”。因此，刘文龙邀请其师许誉卿反教。同时又偶然拜访“盟社”李犹龙以及桃源上官宪、费隐通容等人，得知已有不少反教文献。李犹龙则著有反教文章《诛邪显据录》。<sup>⑥</sup>

在徐昌治所校的《福严费隐容禅师纪年录》中，清晰可见上官宪、刘文龙、李犹龙、徐昌治与通容的关系。其中“九年丙子”（1636）条载，是年夏费隐到“西瓯”，“李犹龙谒师”，“是秋，僧清宇请住莲峰，外翰上官宪、绅士刘云子、李犹龙，皆依座下，朝夕咨询。漳绅颜壮其见师语录，肃启请举扬大法，……西人创天主教毁佛，师著《原道辟邪》一卷。”<sup>⑦</sup>

很显然，黄贞所辑《破邪集》与徐昌治最后编纂的《破邪集》稍有不同。最后刻印出版的《破邪集》中加入了其他文集的反教文章，诸如《南官署牍》中的奏疏、许大受的《圣朝佐辟》一卷、祿宏的《天说》、释普润所编《诛左集》中的《天学初辟》九篇（释如纯撰）等等。释普润即唯一普润，其与费隐通融等属于龙池派。而且，密云圆悟即其师祖（其师为雪峤圆信）。<sup>⑧</sup>其在《破邪集》中曾跋张广浩的《证妄说》。<sup>⑨</sup>释如纯即善一如纯，俗姓张，贵州习安人，曾撰有《黔南会灯录》八卷。<sup>⑩</sup>本书所收录之禅家，以临济宗天童圆悟之法嗣破山海明之法系最多。<sup>⑪</sup>可见《破邪集》中，反对天主教的佛教僧众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。具体来说，浙江反教群体以天童圆悟为核心，僧人唯一普润、古德大贤、善一如纯、居士张广浩等与圆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同时，这些佛教反教群体实际上延续了杭州云栖祿宏与天主教辩论的传统。而

① 载钱士升：《周易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经部20册，592页上。钱士升与天主教徒瞿耜、魏学濂、魏学渠交善。孟儒望在其《天学略义》中提及“武唐塞庵钱相国亦曰，足为吾儒补亡。”其中钱相国即钱士升，载《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》第二册，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64，899页。

② 前已提及许乐善在南京时可能对天主教有所帮助，许乐善孙许远度娶徐光启孙女甘弟大，许远度子许纘曾；许誉卿是许汝升之孙，而许汝升是许乐善之侄，参见岑大利：《中国历代乡绅史话》沈阳：沈阳出版社，2007，101页；另参见刘耘华：《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——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纘曾再论》，载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4（2008）：72—77页。

③ 刘文龙：《统正序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八，637页下。

④ 参见（民国）詹宣猷等修，（民国）蔡振坚等纂《建瓯县志》卷八，民国十八年铅印本，《中国地方志丛书》第95号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，104页上。

⑤ 詹兆恒，字月如，永丰人。崇祯四年（1631）进士。由瓯宁知县，征授南京御史。屡疏建言灭“贼”。福王立南京，任大理寺少卿。唐王立，任兵部左侍郎。进攻开化县，兵败，阵亡。詹事迹参见（清）抱阳生：《甲申朝事小纪》三编卷六《詹兆恒纪》，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7，602页；詹宣猷等修、蔡振坚等纂：《建瓯县志》卷二十九，337页上；（清）邓其文纂修：《瓯宁县志》卷五，康熙三十二年刊本，《中国地方志丛书》第94号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，96页上。

⑥ 李犹龙：《诛邪显据录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六，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10辑4册，425下—426页上。

⑦ 《嘉兴大藏经》第二十六册（No. B178）《费隐禅师语录》，[http://taipei.ddbc.edu.tw/sutra/JB178\\_014.php](http://taipei.ddbc.edu.tw/sutra/JB178_014.php)

⑧ 参见陈垣：《龙池世谱》，附于氏著《汤若望与木陈忞》，载黄夏年主编《陈垣集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5年，108页。

⑨ 张广浩：《证妄说》，载《圣朝破邪集》卷七，634页下。

⑩ 释如纯：《黔南会灯录》，载《中国禅宗大典》，赵晓梅、土登班玛主编，北京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665上—740页下、736页上。

⑪ 陈垣：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30—35页。

延至清初的佛教与天主教之间的辩论，实际上仍延续了明末耶佛论争之绪余。而其中佛教以临济宗为主体。同时，若对《破邪集》中“福建、浙江反教运动”中所参与的人物，按其籍贯以及身份予以分析，可以得出下表。其中福建所占的比重最大。如果加上1638年李维垣等人《攘夷报国公揭》所附的名单，则福建反教人数达56人。其中大部分为儒家士大夫以及儒生、布衣等等。福建反教群体所撰写的文章数也占一半以上（22篇）。而在浙江的反教群体中，由佛教僧人以及佛教居士所占的比例达70%。因此可以发现在福建、浙江等地的反教运动中，反教主体构成并不相同。福建反教的主体力量是儒家士大夫，而杭州则为佛教。究其原因，概与杭州地区佛教兴盛有关。

籍贯	身份				文章数	总计（人数）		
	佛僧	居士	官员	其他		佛教	儒家及其他	总计
福建	1	1	3 (27)①	12 (12)	22	2	15	17 (39)
浙江	4	3	3		15	7	3	10
山西	2				2	2		
江西	1				1	1		
河北	1				1	1		
其他	5				5	5		
總計					41	36 (39) /75		

#### 四

通过以上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福建、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中，人际关系网络是凝聚反教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尤其是师生、同年、同僚、同乡、同门等关系在反教群体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虽然福建、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大部分只是在书面层次上的辩论与冲突，但在不同地方目的不尽相同。杭州地区反教群体以佛教为主体，其反教活动主要是与天主教展开辩论，实际上是对原先天主教攻击佛教的回应。而在福建，反教群体则以儒家为主体，其反教活动一方面是在义理上反对天主教，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官方的途径驱逐天主教传教士。李维垣等人联名上书蒋德璟即是希望通过反教活动，引起朝廷重视，并最终驱逐天主教传教士，解散教会、驱散教友。实际上，1637年就在福安爆发了驱逐传教士的反教运动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反教群体中，有些反教士大夫本身对佛教并不认同，例如撰写反教文章《辟邪管见录》的邹维琏，在其“序”中即如此言，“佛老之害过于杨墨，天主之害过于佛老。”②而邹同时又属于东林。③邹又与同情天主教的叶向高有过交往。④

（责任编辑：袁朝晖）

① 本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利瓦伊垣等上书蒋德璟时联名者数字。

② 参见邹维琏：《管见辟邪录序（附跋）》，载邹维琏：《达观楼集》“序十三”至“序十五”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：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。集部183册，13页下。

③ 参见陈鼎：《东林传》，载邹维琏：《达观楼集二十四卷》，16上—17页下。

④ 参见邹维琏：《谢叶相国赠文》、《谢叶相国》，载邹维琏：《达观楼集》卷十九，246下—247页上；卷二十，258上—259页上。